

T. S. Eliot

〔英〕托·斯·艾略特

李赋宁 杨自伍 等 / 译
陆建德 / 主编

批评批评家 艾略特文集·论文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批评家: 艾略特文集·论文 / (英) 艾略特 (Eliot, T. S.) 著;

李赋宁 杨自伍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6

书名原文: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ISBN 978-7-5327-5346-8

I. 批… II. ①艾… ②李… ③杨… III. 文学批评-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779 号

T. S. Eliot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Copyright © 1965, 1978 by Valerie Elio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批评批评家 艾略特文集·论文 To Criticize the Critic And Other Writings	T. S. Eliot 托·斯·艾略特 著 李赋宁 杨自伍 等译	主编 陆建德 审校 杨自伍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丁宇岚 装帧设计 杨林青
--	--	------------------	----------------------------------

图字: 09-2007-037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5 字数 133,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46-8/I · 3094

定价: 3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397878

说 明

我的丈夫因病无法亲自修订《批评批评家》和《教育的宗旨》两篇论文，因此还是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录在此。假若他尚且在世，一定会加入更多深思熟虑的见解，表达与他的社会学著述中类似的观点。自从在芝加哥发表关于教育的演讲之后，他打算有机会就把这些演讲扩充成一本书，但未能如愿。

应众多读者要求，他答应将《埃兹拉·庞德的韵律与诗作》和《三思“自由体诗”》等论文一并收入这个集子。

瓦·艾

目录

批评批评家(一九六一年) / 1

从爱伦·坡到瓦莱里(一九四八年) / 23

美国的文学和美国的语言(一九五三年) / 45

教育的宗旨(一九五〇年) / 69

一 “教育”能够界定吗 / 69

二 宗旨之间的关系 / 91

三 宗旨之间的冲突 / 110

四 宗教问题 / 129

但丁于我的意义(一九五〇年) / 151

政治文学(一九五五年) / 165

古典文学和文学家(一九四二年) / 177

埃兹拉·庞德的韵律与诗作(一九一七年) / 201

三思“自由体诗”(一九一七年) / 241

批评批评家*

文学批评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哪些用处？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再问，哪怕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批评，或可套用弗·赫·布拉德利^①讲形而上学的说法，就是“为我们靠直觉相信的东西勉强找些理由，但找这些理由本身也就是直觉”。而我要谈的又是自己的文学批评，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么做的理由。我回顾了自己四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希望能够得出一些结论，一些更为普适可行的概括，或者，能激发别人这么去做（这样可能会更有意义）；也希望能激发其他批评家来做这样的反思。我之所以要谈自己的文学批评，因为任何批评家，无论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我对他们作品的了解，都不如对我自己作品的了解透彻。我对自己的文章和评论的来龙去脉更为了解。我知道自己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写作背景和写作动机，也知道岁月流逝所带来的态度、趣味、兴趣和信念的种种变化。有些英语批评大师，我虽崇仰之至，却不可能对他们的作品了解得如此详尽。此时此

刻，我想到的是塞缪尔·约翰逊和柯勒律治，却也并没有忘却德莱顿或阿诺德。不过，说到这里，我要区分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家，以提醒大家，研究某一类批评家中某一位的作品，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适合其他批评家。

在与我不同类型的批评家中，首先要说的是职业批评家。文学评论是他主要、也是唯一的声望来源。也不妨称之为超级批评家，因为他通常是某报或某刊的特约批评家，他的每篇文章都是为新书面世而作。代表人物当然是法国批评家圣伯夫。他虽然也写过两本力作——《波尔罗亚尔隐修院史》和《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学集团》，但他的主要作品，是一卷又一卷的文集^②，所收的文章都是原先一周接一周地在报纸专栏中发表的。职业批评家有可能是不成功的创造性作家，圣伯夫显然就是。读他的诗（如果还能找到的话），绝对有助于理解他为什么写过去的作家比写同时代的作家写得好。不过，职业批评家不一定非得是不成功的诗人、剧作家或小说家。据我所知，我的美国老友保罗·埃尔默·莫尔^③就从未涉足创造性写作，但其《谢尔本随笔》却像圣伯夫的《月曜日漫谈》

* 本文为1961年7月艾略特在利兹大学所作的第6次毕业典礼讲座。——原注

① 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英国哲学家，受黑格尔思想影响较深，著有《伦理学研究》、《现象和实在：形而上学论稿》等。

② 此处指圣伯夫 (Sainte-Beuve, 1804—1869) 15卷的评论文集《月曜日漫谈》(*Causeries du lundi*，也译作《星期一谈文》)以及13卷的《新月曜日》(*Nouveaux lundis*)。

③ Paul Elmer More (1864—1937)，美国评论家，文学批评中新人文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文集《谢尔本随笔》(*Shelburne Essays*)共14卷，其中大部分文章发表于《民族》(*Nation*)等杂志。

那样蔚为大观。另一位故友德斯蒙德·麦卡锡^①，也是评书论戏的职业批评家，他的文学活动就是写每周的文章或评论，闲暇时间与人谈天说地，而不是伏案著书。还有埃德蒙·戈斯^②，稍有不同的是，戈斯的不朽声名不是来自他辛勤的评论写作，而是来自一本已成经典的自传——《父与子》。

第二类批评家偏重个人的情趣爱好。这类批评家不是法官，而是辩护人。他评论作品，是为作者声辩。那些作家有时被人遗忘了，有时被不恰当地贬低了。他使我们关注这些作家，引领我们去发现那些曾被忽略的精彩之笔，在原本以为尽是无聊的地方找到引人入胜之处。乔治·圣茨伯里^③就是这样的批评家。他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专嗜二流作家，眼光独到，善于发现常见于二流作家手笔中的卓异之处。除了圣茨伯里，还有谁肯在写一本关于法国小说的书时，让保罗·德·科克^④占的篇幅比福楼拜还多？还有我的故友查尔斯·惠布利^⑤。读一读，比如说，他写托马斯·厄克特^⑥或

① Desmond MacCarthy (1877—1952)，英国评论家，曾任《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杂志的戏剧评论员、《星期日泰晤士报》高级文学评论员。

② Edmund Gosse (1849—1928)，英国评论家，著有《十八世纪文学史》，其自传《父与子》讲述他怎样摆脱父亲束缚、踏入文坛的经过。

③ George Saintsbury (1845—1933)，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著有《伊丽莎白时代文学史》。

④ Paul de Kock (1793—1871)，法国作家，作品极多。

⑤ Charles Whibley (1859—1930)，英国文学评论家，著有《文学肖像》、《文学研究》等。

⑥ Thomas Urquhart (1611—1660)，英国翻译家，译笔生动，译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先生的作品》等。

佩特罗尼乌斯^①的文字。还有奎勒-库奇^②，肯定在剑桥对听他讲座的许多人讲过如何在英国文学中寻找新的快乐源泉。

第三类是学院批评家和理论批评家。之所以把这两者放到一起，是因为他们可能会有重叠。我对这类批评家的界定也许太宽泛了，从纯学者型到哲学家型都包含在内。纯学者型的批评家如威·佩·克尔^③，他可以出人意料地将某一时代的作家与另一时代的作家，或某一语言的作家与另一语言的作家相提并论；哲学家型的批评家如艾·阿·理查兹^④及其信徒威廉·燕卜苏^⑤。理查兹先生和燕卜苏先生又都是诗人，但我不觉得他们的文学评论是他们写诗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当代批评家，如莱·查·奈茨^⑥或威尔逊·奈特^⑦，除了把他们看作集教学与创造性评论于一身的人，还能把他们归到哪儿呢？还有一位重要的批评家，弗·雷·利维斯^⑧博士，如果不说他既是道德家又是批评家，

① Petronius (? —66)，古罗马作家，著有喜剧式传奇小说《萨蒂利孔》(Satyricon)。

② Quiller-Couch (1863—1944)，英国诗人、小说家，编有《1250年—1900年牛津英国诗选》，著有《莎士比亚的技巧》等。

③ William Paton Ker (1855—1923)，苏格兰文学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著有《丁尼生》。

④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英国评论家、诗人，对新批评派的出现有很大影响，著有《文学批评原理》等。

⑤ Sir William Empson (1906—1984)，英国诗人、评论家。他的《晦涩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影响的评论著作之一。

⑥ Lionel Charles Knights (1906—1997)，英国文学评论家，剑桥大学教授，著有《约翰逊时代的戏剧与社会》。

⑦ G. Wilson Knight (1897—1985)，英国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于利兹大学。

⑧ 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英国文学评论家，创办了评论季刊《细读》(Scrutiny)。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关心社会的健康。

又能怎么说呢？批评家如果兼做学术工作，很可能对某一时期或某位作家有专门研究，但若称之为“某某专家”批评家，又像是在剥夺他随意涉足其他文学领域的权利。

最后要说的这类批评家，可以说，他的评论只是他创作活动的副产品。尤其是身为诗人的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如塞缪尔·约翰逊，柯勒律治，写序言的德莱顿和拉辛和某种程度上的马修·阿诺德。我正是忝在他们之列。我希望，诸位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今天要讲自己的批评作品，并不是因为我懒惰。当然，也绝不是出于虚荣，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自己的很多文章我也是好久没有读了，因此，读的时候也是心里没底，并不是很有信心。

可以欣慰地说，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读完之后，我并没有感到羞愧不已。当然，有些说法我已经不再认同；有些观点，也不像早先那般理直气壮了，或者说，如果还要那样说的话，就得加上一些重要的前提；还有些话，我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也许是因为，在某些方面，我知道得更多了些；而有些方面，我的知识已经蒸发了。比如，重读我论帕斯卡尔的文章时，我惊讶于自己当时掌握的资料竟如此之多。也有些问题，我已经没了兴趣，因此，要是有人问我，是不是还那样认为，我只能说“不知道”或者“无所

谓”。还有些是当时判断上的错误。更为遗憾的是，还有些是语气上的不妥，偶尔会有些傲慢，有些激愤，有些武断和专横。其实，这就是一个性本温顺的人，一旦躲在打字机后面，安全无虞了，就会带出来的那种狂妄自大。尽管有了这么多不同，但我并不想和当年写这些东西时的我一刀两断，我和当时的我还是同一个人。

不过，我这么说是有一个前提的。经常有人引用我的话，可能是我三四十年前说的，却当作是我昨天才说的。这让我很恼火。有位评论我作品的人，很有才华，也很欣赏我的作品，但他说起我先前的评论作品来，就好像我一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就勾勒出了一个宏大的批评框架，此后的日子不过是往上增砖添瓦罢了。每当我出版一部文集，或在别处重印原先的文章，我都特别注意标出最初发表的时间，以提醒读者，这并不是作者现在写的，如今作者本人也已不同往昔。但这位作家在引用我的话时，却很少说“这是艾略特先生一九三三年的看法（或感受）”（或其他时间写的）。作家们都会经常见到，有并不十分严谨的论者断章取义，在自己的话里安上原本没有的意思。但把多年以前的言论当成昨天才说的来引用，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没有恶意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信仰，但早就觉得不合适了，却仍如影随形地伴着我。这句话出自文集《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序言，大意是说，我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我本应预见到，如此适于摘引的句子会跟随我一辈子，就像雪莱说的，

他的思想尾随着他：

他的那些思想，就如狂怒的猎犬，

沿着那坎坷崎岖的路，追赶着它们的父亲，它们的猎物。^①

那句话缘自我的一段个人经历。欧文·白璧德是我早年的老师，也是我的导师，我曾受他教诲颇多。他在巴黎讲学后，返回哈佛，途经伦敦时，偕其夫人一道与我用餐。我当时也已经多年没见他了，觉得有必要告诉他，我刚接受了洗礼，已成为英国国教信徒。当时（我想应该是一九二七年），我的读者不多，都还不知道这一点。我知道，不管哪个学生，做出这种叛逆之举，白璧德知道了肯定会很震惊。虽然，令他更为震惊的事也有过。我说的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战友保罗·埃尔默·莫尔，已经叛离人文主义，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可是，听了我的话，白璧德只是说了句：“我觉得你应该公开说出来。”听了这话，我可能有些生气，恰好当时我正在准备出版一部文集，那句适于摘引的话便出现在序言中，自此便进入了轨道，一直环绕着我的小世界。其实，我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变，也仍旧力主有君主政体的各国保持其君主政体，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我觉得这些说法对我来说已经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不过，即使我对自己信仰的表述并未因时过境迁而需要修改，

^① 引自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为悼念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而作的长诗《阿多尼斯》(Adonais)第31节。

我也不愿再用一模一样的说法了。

从我的文章被参考、引用和收入文集的情况来看，早期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更深。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年轻人的武断。年轻的时候，我们看问题棱角分明；随着年岁渐长，我们喜欢说话留有余地，即便明确的观点，也要多加限定，喜欢插入更多的括号。我们能预见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反驳，我们对论敌更为宽容，有时甚至是同情。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说起自己的观点来底气十足，坚信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我们要么激情澎湃，要么义愤填膺。读者都喜欢十分自信的作者，就连老练的读者也不例外。我早期的一些评论能一直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不太好理解，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早期的评论，不管是谈论诗歌的一般主张，还是对影响过我的作家的评论，都是在暗中为我和我的朋友们所写的那种诗辩护。这就使我的文章有了一种气势，带着辩护者的迫切和激情。我后期的文章就没有了这种气势，个人情感因素少了，但愿是更公正了一些。我早期文章的矛头所向，不只是乔治王朝^①的诗歌，还有乔治王朝的批评。当时的写作背景，今日的读者要么已经忘却，要么就根本没有经历过。

我讲过约翰逊的《诗人传》，后来收在我的一篇文章与演说集^②中。我在那篇讲稿中指出，评判过往时代的任何批评家的判断，都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竭力站在他的视角上看问题。这

① 1714 至 1830 年英王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时代。

② 《论诗和诗人》(On Poetry and Poets, Faber & Faber, 1957)。——原注

对想象力要求很高，能做到一分就很不错了。从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中间经过了很多代人，不可避免地会有趣味的变化，或者我们对那个时代之前的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创作和批评，都不容忽略。不过，只要努力了，记着还有这么些困难，工夫就算没有白费。重读我早期的评论，我惊讶于自己受当时文学环境的影响竟如此之大，惊讶于自己居然能那么成熟，惊讶于我受到的那些影响，惊讶于每篇文章的缘起。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所有这些情形，回忆不出当时确切的写作背景，将来评论我的作品的批评家就更不用说了。即便他知道这些情形，又能理解多少呢？就算他也能理解，但比起这些作品初次面世时的读者，还能有那种感同身受的兴致吗？文学批评至多也就是引起后人的好奇之心，除非它自身仍对后人有所启迪，有超越自身历史背景的固有价值。但即便这样的评论字字句句都具有这种永恒的价值，我们也应尽力站在它的作者和它最初的读者的角度上去读，这样才能更确切地把握它的价值。照这个方法去读约翰逊和柯勒律治的评论，无疑会受益匪浅。

我把自己的评论作品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最初是《自我主义者》¹ 阶段。这份优秀的双周刊由哈丽雅特·韦弗² 女士编辑出

1 《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 1914 年创刊，延续到 1919 年年底，先是双周刊，后改为月刊。

2 Harriet Weaver (1876—196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杂志编辑。

版。理查德·奥尔丁顿^①曾任助理编辑，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埃兹拉·庞德便向韦弗女士推荐由我来接任。我在《自我主义者》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传统与个人才能》。至今，为美国大学生编写文选教科书的人仍很青睐这篇文章。当时，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欧文·白璧德，一位是埃兹拉·庞德。乍一看，这两种影响似乎很难相容，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庞德的影响，可见于我谈论雷米·德·古尔蒙^②的文章；也可见于我写亨利·詹姆斯的文章，庞德对詹姆斯很是崇拜，不过，我对詹姆斯的热情倒是有些消褪；还可见于我杂七杂八地提到的作者，如加文·道格拉斯^③，我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白璧德对我的影响（后来还有托·厄·休姆^④的影响，以及夏尔·莫拉斯^⑤的文章中更偏重文学的那些），在我反复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个时期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后，《自我主义者》停刊，我开始为两位编辑撰写文章和书评。一位是米德尔顿·默里^⑥，他编辑《雅典娜神庙》^⑦，这份刊物没

① Richard Aldington (1892—1962)，英国作家、评论家，著有《英雄之死》。

② Rémy de Gourmont (1858—1915)，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文学漫步》、《哲学漫步》等。

③ Gavin Douglas (1474—1522)，苏格兰诗人，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的第一个英译者。

④ Thomas Ernest Hulme (1883—1917)，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意象派创始人之一。

⑤ 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作家及政论家。

⑥ 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评论家，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的丈夫。

⑦ *Athenaeum*，创刊于1828年，刊登文学和艺术评论，1921年与《民族》合并，1931年再度并入《新政治家》。

能办多久；另一位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编辑布鲁斯·里奇蒙^①。我很幸运，因为他们让我评论的书通常都很适合我。我给这两份刊物写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没再重印，但最好的那些都已经收录到我的文集中了，也算在我最好的文章之列吧。出于种种原因，第三个时期的作品不再是文章和书评，而是公开的讲座和演说。

我想在一般性的文章（如《传统与个人才能》）和讨论具体作家的文章之间划一条线。这种区分很重要。我觉得，恰恰是后一类文章最有望惠及将来的读者。这或许也适用于我这一类的其他批评家。不过，后一类文章也要做个区分。几年前，纽约的出版商出了我的一本平装本文选，是论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时期戏剧的。文章是我自己选的，我还写了个序，解释之所以选它们的原因。我发现，仍能让我觉得兴味盎然的文章，是论莎士比亚同时代作家的，而不是论莎士比亚本人的。正是从这些次要作家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写出了自己的诗歌；是他们，而不是莎士比亚，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锤炼了我的节奏感，滋养了我的情感。我读他们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最适合我的性情和发展的时候，我读得心潮澎湃，忘乎所以，许久才能有点想法，才能提笔评论他们。在我诗兴不断涌起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就成了我的导师。正如影响我的现代诗人不是波德莱尔，而是朱尔·拉弗格^②，影响我的戏剧诗人也不是莎士

① Bruce Richmond (1871—196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于1902年）早期的编辑。

② Jules Laforgue (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著有《怨歌集》。

比亚，而是马洛、韦伯斯特、图尔纳、米德尔顿和福特^①。莎士比亚这样的泰斗，基本上无法影响别人，只能被别人模仿。影响与模仿的区别在于，影响会促成丰饶多产，而模仿——尤其是无意识的模仿——只会导致贫瘠不毛。（我有一段时间也曾尝试模仿但丁，但我那时候已经五十五岁，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模仿另一种语言的作家通常会有所收获，因为我们不可能模仿成功。

以上说的这类批评文章最有可能传诸后世，因为它们最有可能给未来的读者带来乐趣，或者加深他们对所论作家的理解。关于这类文章，就说这些吧。现在，再来说说那些一般性的文章，还有那些颇具影响的术语，如“感性的脱节”、“客观对应物”。这又让我想到了给《标准》^②写的一篇文章，谈的就是“批评的功能”。时隔这么久，我自己也拿不准刚才提到的那两个术语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有认真的学者或学生写信来，要我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我通常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客观对应物”出自《哈姆雷特》一文，若说我有故意挑衅的味道，这也许并非完全无辜，因为我当时正和无畏的论士约·麦·罗伯逊^③并肩作战，支持他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戏剧的评论。不管这些术语将来会怎么样，我即便现在没法有力地为它们辩护，但至少觉得它们当时还是起到

① 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John Webster (约 1580—1625)、Cyril Tourneur (约 1575—1626)、Thomas Middleton (约 1580—1627)、John Ford (约 1586—1639) 均为英国剧作家。

② *The Criterion*，艾略特于 1922 至 1939 年主编的文学评论季刊。

③ John Mackinnon Robertson (1856—1933)，英国评论家，著有《道德简史》。